

愛知行走過二十春秋

萬延海

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所長

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人

摘要

值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及其前身北京愛知行動專案成立 20 周年之際，本文回顧了愛知行創辦的背景，介紹了在維護男女同性戀者人權上的工作，介紹了揭露河南汙血愛滋流行和幫助患者維權的情況。文章簡單介紹愛知行在廣泛的社會邊緣弱勢群體中開展健康和權益保護的工作，包括在性工作者、藥物成癮者、維吾爾少數民族等人群中的工作。在介紹愛知行和作者本人遭遇的來自政府的打壓後，作者也說明了和基金單位的艱難關係。最後，作者對愛知行在當前環境可能的作為進行了簡單分析。

關鍵字

愛知行、愛滋病、同性戀、血液污染

.....

1994 年 3 月下旬，我在北京羊坊店的住所對外發出了「北京愛知行動專案」成立的消息。至今已經二十年了。

今年是我們二十周年生日，我卻人在海外，不能回國與同仁們一起為國家的愛滋病防治工作服務，無法與愛滋病患者們一起維護他們應該有的權利。

回顧過去二十年的經歷，可謂是風風雨雨，但也充滿著成長、助人、友誼和工作的快樂。本文分下面七個部分來展開：

- 1、愛知行的創辦
- 2、維護同性戀的權益
- 3、幫助汙血案受害人維權

- 4、深入邊緣弱勢群體提供健康和法律服務
- 5、現在的工作
- 6、來自中國政府的麻煩
- 7、與美國基金會的關係
- 8、路在何方？

一、愛知行的創辦

創辦愛知行動項目的時候，我還在衛生部下的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但處於閒職、工資被克扣、被禁止參與任何相關愛滋病防治教育和性學研究的狀態。

1988年夏天，我從上海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教育專業畢業後，經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辦公室衛生宣傳處統一安排，分配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衛生宣傳處處長陳秉中先生後來擔任研究所所長，並於1993年夏天與我一起出事。我被停職，他被要求提前退休。

1993年5月10日，衛生部部長陳敏章代表部黨組向陳秉中所長下達下列指示：1、暫停萬延海在「愛滋病求助熱線」的工作；2、停止「男人的世界」同性戀文化沙龍活動；3、陳秉中和萬延海等人在《中國健康教育》雜誌上的兩篇文章涉嫌鼓吹人權、鼓吹同性戀和同情妓女。

隨後不久，陳秉中所長職務被免除。我被告知，我不得參與研究所內任何關於愛滋病和性議題的研究工作。

同期，公安部下文取締「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龍，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威脅要派駐工作組，調查《中國健康教育》雜誌上的學術文章涉嫌嚴重思想意識錯誤的問題。衛生部新聞主管部門審查取締了1993年《中國健康教育》雜誌第八期，因為雜誌準備刊登陳秉中一篇關於在同性戀人群中開展愛滋病防治工作和人權保護工作的文章。

1993年底，我開始組建「北京愛知行動專案」，並於1994年3月底對外發佈專案成立消息。之所以叫做專案，而不是組織，是為防止被依照非法社團而予以取締。沒有用愛滋病的名字，是因為不希望衛生部門可以來管轄我們的

工作。我們希望用科學和人道主義來挑戰對疾病的無知、偏見和歧視。

愛知行最早掛靠在北京一家私立的「北京現代管理學院」，下設健康人類學系，作為北京愛知行動專案對外開展工作的依靠。但因為愛知行涉及敏感的性少數與人權的工作，為避免給機構帶來麻煩，大多數情況並不提及單位名稱。

媒體報導專案成立消息後，公安部即對全國婦聯下達檔，指稱萬延海是其監控物件，要求婦聯批評旗下的《中國婦女報》關於北京愛知行動專案成立的報導。消息隨即在北京媒體界傳開，萬延海和愛知行被正式打入黑名單上。我隨後也被強制辭職。公安部、中宣部和新聞總署 90 年代中期多次下達了內部通報，要求關注愛知行和萬延海的動態，不得刊登萬延海的文章，包括筆名撰寫的文章。我在黑名單上也有二十多年了！

二、維護同性戀的權益

北京愛知行動項目，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主要的工作有維護男女同性戀者的權益，在男同性戀人群中開展愛滋病教育，推動安全性行為教育。當時，編輯《愛知簡報》，給全國各地的男女同性戀社群、專家學者、媒體人士和政府官員們郵寄，也在北京等城市的公園和聚會中散發。

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邱仁宗教授的協助，愛知行於 1994 年獲得美國伊利莎白愛滋病基金會的資助。隨後，基本上依靠個人捐款來維持項目運營。

在九十年代，愛知行調查了天津（1994 年 3 月）、北京（1994 年 8 月）等地公安部門抓捕男同性戀者的情況，並通過大學講座、出版物、媒體記者對外發佈呼籲。愛知行也處理了大量同性戀者遭遇犯罪分子敲詐勒索的事件。犯罪分子可能是同性戀者圈內人、前科罪犯、員警或協助員警辦案的聯防。¹

九十年代中後期，愛知行積極推動中國精神衛生領域對同性戀的討論，中國和美國精神衛生同行對同性戀議題的對話，也推動中華精神科學會修改對同性戀的醫學定義，不再籠統地把同性戀性傾向定義為疾病。

1 編者註：「聯防」即指「治安聯防隊」，是中國民間一種群眾性的自治組織，成立目的在於協助公安機關維持地方秩序。「聯防」的權力並非源於法律授權，而是接受公安委託而來，故不能以其自身的名義獨立行使具體的行政行為。「聯防」組織的出現係為彌補公安警力的不足，但近來常有聯防隊員隨意執法、濫用私刑的案例。

進入二十一世紀，愛知行參與處理的同性戀權利事務，基本是和其他男女同性戀權益團體共同推動的，包括組織男女同性戀學生夏令營、同性戀驕傲月活動、開播電臺同性戀專欄節目、發佈和宣講《日惹原則》²、要求廣電總局解除對同性戀電影的禁令、參與國際男女同性戀運動等。愛知行直接處理的主要是一些涉及公安部門抓人的事件，比如公安查抄同性戀網站、在公園、酒吧和浴池抓人的事件，以及同性戀網站受駭客大規模攻擊事件等。

和維護同性戀人權相關的一件工作，是 1999 年和 2000 年對保守宗教團體的禁欲教育和反同性戀立場的研究。2000 年 7 月，愛知行發佈對韓國統一教會及其在華和中共黨政部門合作開展絕對禁欲教育的研究報告，推動大陸衛生部門開展基於科學的愛滋病防治教育。

三、幫助污血案受害人維權

1998 年，愛知行開始幫助山西臨汾輸血感染愛滋病少年宋鵬飛維權，要求醫療單位賠償，獲得國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和支持。通過在消費者協會報案，我們推動了中國病人權利保護及其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社會辯論。

2000 年 8 月底開始，愛知行全面介入中原河南省農民賣血感染愛滋病患者的維權工作，在揭發政府掩蓋污血案愛滋病流行真相上發揮了重要的組織和社會動員作用。我們幫助高耀潔對外發出聲音，說明愛滋病患者組織起來，說明媒體及時獲得來自愛滋病嚴重村莊維權抗爭的第一手消息。

2003 年開始，愛知行開始幫助使用血液製品感染愛滋病和丙型肝炎的血友病人維權，直到 2010 年政府提出完整的補償方案。2005 年開始，愛知行全面介入和組織因輸血感染愛滋病和丙肝的受害人維權。

2 編者註：雖然在國際人權標準中，已經確認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為每個人尊嚴與人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不能以其為不平等與歧視的來源，但是當基於性傾向與性別認同而來的人權侵犯出現時，不同國家與社會的反應仍然很不一致。為了促使世界各國對國際人權法在相關問題的適用有一致的理解，以「國際法學家協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及「國際人權服務社」（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為首的一個國際聯盟發起了一項計畫，為國際法在相關人權侵犯事件中的適用草擬一系列原則。2006年11月6日至9日，國際人權法專家於印尼的日惹市聚會，檢視原則的草案，經過溝通與討論後，通過《關於將國際人權法應用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相關事務的日惹原則》（The Yogyakarta Principles: Principl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 Relation to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直到現在，愛知行依然是河南等地愛滋病感染者維權抗爭的重要夥伴、支持者和組織者。也因此，我們也一直被河南當局及相關官員忌恨在心。在過去十二年的時間裡，無論我個人，還是志願者遭遇的政治困難，主要來自河南當局製造的各種口舌。

四、深入邊緣弱勢群體提供健康和法律服務

因河南污血愛滋病危機，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積極關注和支持中國愛滋病防治，大批媒體記者和志願者參與愛滋病救援，國際資金也大量進入中國。國際資源包括國際發展援助基金和公共衛生資金、人權和民主基金、慈善團體和個人的參與。

在全球公共衛生合作和全球抗擊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等框架下，中國政府也開始接納民間社會組織參與愛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在這種背景下，愛知行於 2002 年 9 月在北京註冊為「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並開始接受國際基金援助，其中來自美國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斯基金會）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金一直占愛知行獲贈款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2004 年後，愛知行開始全面參與愛滋病防治教育、權益宣導、民間社會組織的發展和援助。除了在北京、昆明和其他地區辦公室直接參與的項目活動外，愛知行有機會利用獲得的國際資源，建立與其它民間社會組織的合作關係，特別是那些由疾病患者和受到疾病打擊的弱勢邊緣社群建立的團體。我們在下列邊緣弱勢群體中開展愛滋病防治、關懷和權益宣導活動，並提供法律服務：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愛滋病病人、血友病人、男女同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性工作（女、男、跨性別）、流動人群、藥物成癮者、少數民族和青年學生。

2004-2010 年期間，每年大約有 20-40 個團體利用愛知行的資源，合作開展專案活動，包括在數十個城市男同性戀人群中推廣安全套的使用。2003-2010 年期間，提供資助的民間社會組織或學生社團超過了 150 個。愛知行直接組織和發起了一些全國或地區性的民間組織網路和協作專案。

愛知行在北京和昆明建立了長期的辦公室，在瀋陽和廣州有過短暫的辦公室。在北京，曾經直接在女性性工作人群、藥物成癮人群、同性戀社群開展

愛滋病防治工作和法律權益保護，並在上述人群建立專門的社群辦公室或活動室。我們曾經有二十多名全職工作人員，工資單上的全職和兼職工作人員達到九十多人。

五、現在的工作

因為國際基金的變化及中國政府的打壓，愛知行於 2010 年開始放棄了大量受愛滋病打擊的邊緣弱勢群體的愛滋病防治服務和法律權益保護工作，包括停止向同性戀社群組織提供安全套和派發安全套的經費。

2013 年 5 月，在遭遇員警多次對法律工作人員騷擾後，愛知行關閉在廣州的辦公室，停止在流動維吾爾人群眾中直接開展的健康和法律工作。

目前，愛知行依然堅持的工作包括支援污血案受害愛滋病患者獲得政府賠償、改善醫療和獲得生活幫助。愛知行提供法律上的支援，維權和社交媒體能力建設，輿論上的支援等。同時，我們幫助生活困難的感染者及其家人獲取最低生活保障、感染兒童福利金、廉租房或公租房等。我們通過聯合國人權審議、政府資訊公開和社群能力建設，推動賠償、醫療和福利救助政策的落實。

2011 年 -2013 年期間，愛知行積極推動中國衛生部門和民政部愛滋病防治、關懷救助資金資訊公開，推動廉政和政策落實。

目前，愛知行已經不再接受長期、固定的基金，而是尋求短期、小額的捐款，特別是鼓勵個人捐款支持志願者的工作。愛知行只有一名全職人員，獲支付薪酬的兼職或志願者不到 10 人。愛知行已經關閉了在北京的辦公室，不再有原來的財務和專案管理團隊。我們目前依靠直接的社群對話、志願者參與、小額資金來支持權益宣導和監督政府政策落實的工作。

六、來自中國政府的麻煩

在過去的 20 年中，我個人遭遇三次重大的政治衝擊和麻煩，並先後三次離開中國至美國長期居住。第一次是 1997 年元旦。第二次是 2002 年 10 月，我剛剛離開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不久。第三次是 2010 年 4 月底，我們全家人離開了自己的國家。我曾多次被員警抓捕、調查、軟禁，也受到過各種各樣的人身攻擊和政治攻擊。愛知行也在其中遭遇各種坎坷。

第一個麻煩：

1990年至1993年期間，我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從事愛滋病預防教育和研究工作，觸及性教育、同性戀者權益、社會參與等議題，建立「愛滋病求助熱線」、男同性戀者教育和交流活動的「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龍。1993年5月10日，在公安部、新聞出版總署等部門壓力下，衛生部黨組要求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停止我的工作，認為我們的工作和文章在鼓吹人權、鼓吹同性戀和同情妓女。

支援我工作的研究所所長陳秉中先生隨後被要求退休。我個人一年後被迫辭去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工作，個人生活處於動盪和漂泊之中。

公安部檔已經失效，而目前我國衛生部門從中央到地方在男同性戀人群中的工作和我們20年前的工作是一致的。我們20年前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的探索性工作為後來的工作積累了經驗和人才。

儘管公安部的檔已經失效，但對我個人的影響很大。我個人處於公安部門監控和很難在國內媒體上發表文章。在此種環境，我後來成立的團體和開展的工作，持續不被政府部門信任和支持，並多次出現矛盾和衝突。

第二個麻煩：

從2000年至今，愛知行一直關注河南省因為賣血和輸血而感染愛滋病的群體，協助他們獲得醫療、救助、賠償和維護他們的權益，特別是被愛滋病感染的很多婦女和孤兒。我們的工作觸及到一些衛生部門的腐敗分子，我個人多次受到他們的陷害，會議被迫取消。我兩次失去自由，無數次處於被嚴密監控的狀態。機構工作也受到嚴重干擾。

2002年8月24日至9月20日，我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洩露國家機密，涉及對外發佈一份河南省衛生廳起草的愛滋病工作檔。

2006年11月下旬，在我召集的一次全國輸血感染愛滋病受害人會議前夕，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國保人員帶走，會議被迫取消。隨後，各種誤解誤會不斷，河南省腐敗分子給我構陷的謠言也層出不窮，包括舉報我在2008年全國兩會前組織河南感染者去天安門自焚、奧運會火炬經過河南境內時組織感染者搶奪

火炬、2009 年呼籲全國大罷工、罷課等。

第三個麻煩：

因為在揭開河南愛滋病污血案醜聞上的貢獻，以及在中國被打壓、拘留，萬延海個人和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在國際上獲得聲望。2003 年後，北京愛知行研究所開始獲得國際上各種基金組織的支援，特別是關心人權和民主化基金團體的支援，包括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國際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斯基金會）的支持。

2003 年至 2012 年期間，北京愛知行研究所獲得過下列基金組織、大學和政府的支持：

- 1、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 2、國際開放社會研究所
- 3、李維斯基金會
- 4、哈佛大學
- 5、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 6、美國 Astraea 女同性戀基金會
- 7、荷蘭 Mama Cash 基金會
- 8、全球婦女基金會
- 9、加拿大愛滋病法律網路
- 10、澳大利亞愛滋病組織聯盟
- 11、德國米索爾基金會
- 12、法國愛滋病行動基金會
- 13、法國愛滋病團結
- 14、法蘭西基金會
- 15、英國使館
- 16、聯合國人口基金會
- 17、世界衛生組織
- 18、全球基金中國愛滋病專案第四輪專案和第六輪專案
- 19、歐洲聯盟

20、愛爾蘭前線

21、大赦國際

2010年1月開始，愛知行不再接受開放社會研究所的資助。2013年5月1日起，也不再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

我的第三個麻煩主要和我們獲得大量國際人權民主基金、以及期間參與一些敏感人權事件有關，比如胡佳案、陳光誠案、劉曉波和《零八憲章》案、河南愛滋病污血案、公盟和許志勇案、網路自由等。

總體而言，儘管有一些敏感的人權和民主基金支援，我們在愛滋病防治、公共衛生和相關人權維護上的工作，還是得到我國政府認可的，包括在政治上極度敏感的維吾爾民族人群中開展健康和法律支援工作。

2008年後，愛知行就開始遭遇比較多的政治麻煩。在一個各種問題開始混雜在一起、各種力量開始混雜在一起的時代，在當今中國，出現這些問題，也是不可避免的。後來，我家人於2010年4月30日到達香港後，離開祖國來到美國。

如果說，我的第一個麻煩和第二個麻煩，純粹是公共衛生和道義責任，而我個人內心充滿自豪的話，我對第三個麻煩是有反思的。我個人對國際基金和政治民主過於浪漫的情懷影響了我的決策和行動，沒有在愛知行發展良好的時候審時度勢，沒有把握好和政府的關係。在一個政治局勢開始複雜的時刻，不能和政府建立政治信任關係，不僅影響到愛知行機構發展，也嚴重影響了中國愛滋病防治工作。

除遭遇員警打壓外，愛知行還面臨被要求更名、銀行帳戶凍結、外匯管制和稅務稽查等方面的麻煩。

七、與美國基金會的關係

2002年底和2003年初，我在紐約和華盛頓會見了開放總裁和民主基金會的專案官員。當時，我對開放社會研究所瞭解甚少，但知道他們開展一些公共衛生和減低毒品傷害的工作，就提交一個專案書給開放。我聽說過美國民主基金會的事情，知道有相當的敏感性。

我把是否接受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的問題，提交愛知行理事會討論，沒有人反對，理事們認為應該先把錢拿過來做事。我 2003 年初回國期間，按照慣例約見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官員，我也詢問了他們的意見。他們表示，有錢為啥不要，拿到錢把自己的事業做起來再說，但建議我不要對外聲張；我表示，如果我們拿民主基金會的錢，一定會公開這個事情的。我也見到中國國務院扶貧辦的官員，就提出民主基金會資助的事情，扶貧辦官員表示，先拿過來做事；他說，89 年之後，政府為了統戰海外異議人士，允許一些人帶著海外敏感基金回國做事，給予特殊待遇。

我依然心理不踏實。2003 年在耶魯大學訪問期間，我詢問兩位教授的意見，他們都關注中國的法律事務。一位教授表示，開放社會研究所很好，不會有問題；但美國民主基金會的錢來自美國政府，中國政府認為美國政府是頭號敵人，你拿美國民主基金會的錢，中國政府就會把你當敵人。另一位教授說服了我，美國民主基金會是敏感的，但你萬延海已經相當敏感，民主基金不會增加你的敏感性，反而會因為敏感性給你一定的保護。於是，我向美國民主基金會遞交了一份專案書。

我們項目獲得批准。怎麼把錢給我們？我堅持直接撥款給我們，不走任何中間機構轉帳。

於是，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成為美國開放社會研究所在 1989 年後回到中國提供資助的第一個民間組織，也成為美國民主基金會第一個公開在中國資助的團體。這讓我們獲得榮譽。組織迅速發展，並支持和資助了大量草根社群組織和學生組織，提供愛滋病防治、公共衛生和相關人權的社會服務和宣導工作。我們也在網站首頁介紹所有資助者的資訊。

我沒有想到的事情出現了。2004 年底和 2005 年初，中亞地區出現顏色革命，三個國家政權出現變更，美國民主基金會和開放社會研究所被俄羅斯和中國指責為中亞顏色革命背後的推手，認為他們和其他美國基金支援的民間組織在顏色革命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國際政治紛爭難免影響到了我們。媒體列出的反華組織名單上出現了我們的名字。作為兩個基金組織的國內大戶，我們吃的「明槍暗箭」是外人無法想像的。我們依然頑強地堅守在那裡！

我再次變得非常自信。在機構剛剛被稅務局查稅不久，我簽署了《零八憲章》，公開聲援劉曉波，發起對孫東東的挑戰，呼籲廢除綠壩，發起救援公盟和許志永博士。和 1993 年的情況相似，我完全沉浸在戰鬥的無畏和自我想像的勝利之中。

我不僅挑戰政府，也批評聯合國機構，甚至拒絕基金會專案人員的指手畫腳。2009 年 7 月下旬，開放社會研究所中國項目主任來到愛知行辦公室，要求我停止對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及其主持的全球基金草根組織代表選舉的指責，要求我接受選舉的結果，以及放棄一個正在進行中的法律訴訟。我拒絕了。專案人員表示，不希望因為愛知行的原因而使得開放社會研究所被外界提及，他認為開放社會研究所是我們最大的資助者，我應該聽取他們的意見。我對來訪的專案官員表示，我們感謝基金會對我們工作的支持，但錢是你們的，你們決定給誰錢，但這是一個在中國為人民提供服務的獨立民間組織，基金會不能來指揮我們。

不好的消息很快傳來。電話裡已經很氣憤了。2009 年 9 月 1 日，我得到開放社會研究所正式來信，2010 年專案資助將把原先的 35 萬美元一般支援改為針對專門專案的支援，資金總額不超過 15 萬美元，而且 2011 年開始就可能不再資助了，希望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做好準備。

話說到這種地步，我也不想再申請了。我認為基金會不夠義氣。我的美國同事說，你不要意氣用事，你應該去積極爭取，說服基金會改變意見。我有所心動，畢竟 15 萬美元也是不小的數字。我意識到這些美國人和我做事風格的不同，我比較中國式的意氣用事。

更多不好的消息傳來。美國民主基金會專案官員也在到處找人詢問愛知行和萬延海的事情。小道消息說，有人試圖說服美國的基金會們，認為給愛知行資助是一個錯誤。我變得非常沮喪。當天晚上，我分別致信開放總裁和民主基金主管人員，表示 2010 年不再申請兩個基金會的資金，但歡迎兩家基金會在 2010 年前六個月期間來愛知行對資金和項目進行調查。我也表示，我將在 10 月下旬訪問美國，願意當面交流。

後來，考慮到現實，我向民主基金會提出繼續申請的意見，基金會也很積

極。我們繼續申請和接受美國民主基金會的資金。

我如約和開放社會總裁在紐約見面。我本來想很好地解釋一下我們那裡的情況，但談話很短。開放總裁表示，對我們的工作無意見，只是我們涉及太多的爭議。他建議我，如果有意見，可以給他寫個申訴信，他們願意聽取我的意見。

想想自己背後的持槍者，我去申訴的意義在哪裡呢？我找死嗎？我非常難過地離開那個辦公室，一個我曾經當成自己的家來捍衛的地方。

回到中國後，我開始動員員工張羅在國內的籌款工作。我們準備利用愛知行十六周年慶典活動來組織募款，也得到政府衛生和民政部門官員以及國內媒體人士的支援。我們的籌款活動據說是過於浪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和北京市公安局先後開始了調查工作，並最終叫停年會慶典活動。

2011年11月25日，愛知行理事會通過決定，明確宣佈機構非政治立場，尋求在公共衛生科學、法律和人權框架下繼續開展愛滋病防治、關懷和權益保障工作。2013年1月，我代表愛知行通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2013年4月30日資金項目到期後，將不再繼續申請其資助。

八、路在何方？

2011年11月25日，愛知行理事會發佈〈北京愛知行研究所關於進一步開展愛滋病防治和人權保護工作的意見〉，明確表明「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承諾進一步參與中國愛滋病防治工作和相關人權保護工作」，「承諾基於公共衛生科學原理、國際人權準則和中國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規，遵循專案和基金資訊公開透明的原則，開展愛滋病防治工作和人權保護工作。」承諾「將確保我們工作的人道主義性質。我們無意於參與政治紛爭。」

我也於2012年底分別致信中國駐紐約領事館和北京市公安局，提出回國繼續開展愛滋病防治工作的願望，承諾在未來十年的時間內，不參與政治反抗活動。目前，我與當局正在進一步溝通交往之中。我依然還沒有獲准可以回國。

2012年11月中旬，我在香港期間，曾經試圖回國短暫訪問，但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國保員警的叫停。

但我對於愛知行及愛滋病維權工作依然充滿信心。利用社交媒體和直接的社會對話、聯合國人權機制、中國政府資訊公開條例等，我們可以組織和動員起有力的社會抗爭，發出權利的呼聲。

同時，利用中國政府已經確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綱要以及各個部門的法規政策和工作目標，在廣泛的民生議題上，民間社會組織除可以申請註冊和獲得政府資金支援外，還可以在人權的框架下，動員和組織公眾和受疾病影響社群的參與。在政府層面，我們推動開放和透明；在民眾層面，我們推動知情和參與。

20-Year History of *Aizhixing* (Love-Know-Act)

Yanhai Wan

Director, Beijing *Aizhixing* Institute

Visiting Scholar,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The Beijing *Aizhixing* (Love-Know-Act) Institute and its predecessor the Beijing *AIZHI* Action Project will celebrate their 20th anniversary in 2014.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under of *Aizhixing*. *Aizhixing* defends LGBT rights in China and was launched after the discovery of people infected by HIV/AIDS through contaminated blood in Henan, China. The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Aizhixing's* work for health and rights of marginalized people, including sex workers, drug addicts and Uighur people. The author discusses how the Institute copes with pressure from government, and also shares its difficult relationship with charitable foundations. Finally, the author describes how *Aizhixing* will continue its work 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Aizhixing, HIV/AIDS, homosexuality, contaminated blood